

#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思想探源<sup>\*</sup>

## ——克里斯蒂娃研究之二

孙秀丽 李增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提 要:**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符号学界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她提出的解析符号学思想是对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解构与重建。她借鉴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将它们转换成她的动态符号学理论。在研究中,克里斯蒂娃反对结构主义对符号的静态研究,主张在结构的生成与变化中把握符号。她的这一理论主张也决定了她的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质。本文主要从哲学、文学理论、语言学3个方面阐释克里斯蒂娃思想的渊源问题。

**关键词:**解析符号学;哲学;文学理论;语言学;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8)01-0114-4

### On the Theory Sources of Kristeva's Semi-analysis

Sun Xiu-li Li Ze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sts in the western semiotic studies, Julia Kristeva puts forward her theories of semi-analysis which de-construct and rebuild traditional semiotics based on structuralism. She absorbs research methods from varied disciplines and develops her unique semi-analysis theories. Opposed to the static study of structuralism, Kristeva shows her disapproval of grasping the meanings of symbols in the creation and changing process of their structures, which makes her study interdisciplinary.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of elaborating the source theories that influence Kristeva's study, mainly from four perspectives: philosophy, literary theory, linguistics and psychoanalysis.

**Key words:** semi-analysis; philosophy; literary theory; linguistics; psychoanalysis

克里斯蒂娃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她提出的解析符号学理论是对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的解构与重建。她阐述的文本间性、过程主体、符号与象征等原创性概念对我们深入理解语言问题以及现代社会文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她对马拉美等后现代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解读是其符号学的具体应用,同时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她在理论著述中所宣扬的解析符号学思想。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活动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她的理论思想包含的知识量巨大,概念繁多,但“正是这种多重知识的融合、多种理论的交错使她成为当代法国最出

色的符号学理论家之一”(罗婷 2004: 63)。

#### 1 哲学思想源泉

克里斯蒂娃推崇新马克思主义,而且她的符号学思想也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她借鉴马克思实践批评思想(罗婷 2002: 68),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符号学研究中去。可以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符号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在构筑自己的理论过程中极为重视政治经济实践。与之相似,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研究中反对对符号进行静态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主张对符号进行动态研究。也就是说,克里

\*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克里斯蒂娃诗学问题系列研究”(项目编号:11512092)的阶段性成果。

斯蒂娃把意指实践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克里斯蒂娃在《作为文本的小说》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关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考察与她自己在研究符号意义的过程中对意义的生产及传达的关注极其相似。马克思在研究商品价值时提出,商品的价值产生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从而通过研究商品形成之前的劳动把握商品,展示了研究作为物品的商品的外部空间的可能性。同样,克里斯蒂娃也很重视语言的固定意义形成以前的所谓的意义生产过程。她试图通过研究意义生产过程来阐明意义的来源问题,从而实现研究文本符号意义外部空间的可能性。她认为在构成结构的体系内部存在着被结构隐藏的另一场所。而要想真正弄清意义问题,就必须剖析静态的符号,从而在传统静态的符号内部开辟一种不同的研究空间,这种空间与符号结构的外部或所谓的他者相关,对意义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构成语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对这一空间的重视实质上就是重视语言的一些物质性特征,如语音、语调、语气等,就是重视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就是强调参与说话交流过程的主体。而这些对于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说都是语言的所谓异质性特征。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只强调语言的内部,不考虑语言使用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不考虑人的主体性。与此相反,克里斯蒂娃特别重视符号的异质性,认为异质性在决定符号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进行符号学研究中绝对不能忽视这些异质性因素的决定性意义。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克服并超越了传统语言学中意义作用(signification)的范畴。为此,她还提出了意义生成性(significance)这一重要概念。她用这一术语表示意义从萌芽状态到意义作用概念下的意义的生成过程。克里斯蒂娃认为,决定语言符号意义的并不是简单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意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具有生成性和过程性。符号学的目的就是要把握符号意义生成性的各种形态。克里斯蒂娃进一步强调,能指与所指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意义生产不存在最终阶段。具有固定意义的符号只是符号意义发展的一个相对的静止阶段,这种静止随时可能遭到异质力量的入侵而被破坏(Oliver 1997: 54 - 59)。总之,马克思主义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商品价值的产生过程,而克里斯蒂娃则在符号学领域向我们昭示了符号意义的创造生成问题。

同时,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克里斯蒂娃 1984: 114 - 116)。我们知道,黑格尔强调事物的发展要经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肯定阶段,而是经过否定阶段去超越肯定阶段。也就是说,黑格尔强调否定因素的作用。这一观点被克里斯蒂娃吸收并将之进行唯物化。她的所谓对立物的并存实际上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和发展。她认为文本间性是通过否定性才形成的。也就是说,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本总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而这种吸收与转化的基本法则之一就是否定性。通过对劳特莱蒙和罗什富科等人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克里斯蒂娃阐述了否定性在实现句子层面的文本间性中呈现的三种方式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此,西川直子进行过总结和论述(西川直子 2002: 62 - 65)。首先,作者可以通过对句子全体的否定实现文本间性。通过这样的否定,被引用的句子的意义被完全颠倒,变成了与原来意义截然相反的东西。这样,一个文本通过引用另一个文本的句子并对其进行变形,使读者同时阅读到两个文本。其次,作者通过对所引用的句子进行左右对称式的否定进行创作,从而产生互文效果。所谓左右对称式否定,是指对句子前后两部分同时进行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句子整体的逻辑意义不发生变化,但却增加某种新的意义。第三,作者在写作中通过否定句子的一部分改变原句子的意义,产生互文效果。这种变形与前两种变形一样,带来的明显的意义逆转,将被引用的句子与变形后产生的句子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到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克里斯蒂娃指出,文本可以用否定方式回应其他文本。同时,这种回应不是原封不动地模仿,而是通过否定既产生分歧又产生与前文本之间的对话。这不仅是所有文本赖以诞生的基础,而且是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现象说明诗歌文本甚至所有文本在形成过程中都与其它文本产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或相互肯定,或相互否定。

## 2 文学理论思想源泉

克里斯蒂娃在研究符号学的过程中深受巴赫金的影响,并且成为最早向西方学术界介绍巴赫金思想的少数学者之一。在论述巴赫金理论的论文《词、对话与小说》中,克里斯蒂娃阐述了巴赫金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最终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克里斯蒂娃 1980: 64 - 91)。她认为巴赫金很早就

在论著中提出了文本结构不仅存在,而且是由于与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观点。他关注文本语言的对话特征,认为对话是人类语言固有的现象,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同时,巴赫金指出,由于语言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表达都一定存在着多种声音和多种思想。语言符号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生机勃勃的与其存在的语境密切相关的生命体。语言学研究不能抽象地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应该将语言学与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联结。

巴赫金强调词语(包括文学词语)不具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作者、作品角色以及当前文本和历史文本共同决定。按照这一想法,巴赫金将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区分为独白和对话。独白以单一性主体为基础,否定他者的存在,强调在文本中只有作者权威性质的声音,而不存在任何他者的声音。独白话语的表现形式包括叙事文学、历史言述、科学言述以及诗歌言述等。另一方面,对话作为一种言述形式,是语言不同表达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它以复数主体为基础,承认他者的存在,否定作者的权威,强调文本意义由作者与他者共同决定(李增 2005: 95)。对话首先表现在表述者/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其次表现在生活中出现的对立物的同时存在。在对话理论指导下,巴赫金详细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滑稽性讽刺作品以及苏格拉底对话,论述对话性言述的种种形态,分析善恶、生死等对立物之间的并存关系,并将狂欢节话语、滑稽性讽刺以及复调小说中的言述统称为对话话语的表现形式。

克里斯蒂娃在研究巴赫金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文本的生成问题,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展成为各种文本相互关联的文本间性概念。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Kristeva 1980: 66),任何文本都是具有文本间性特征的文本。她的这一观点是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文本的生成问题放在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根据这一概念,文本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从而在最后的文本产品中隐藏着社会历史文本的影子。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着眼于作为能指的文本,在把握文本和其他文本的关系中把握文本和他者的关系。这种文本理论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具有同源关系,实际上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原理在文本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克里斯蒂娃(1980: 65 - 68)将这种对

话的关系性在文本空间的三个层面上进行整理。这三个层面是作品的主体层面、接受者层面以及外部语境或外部文本层面。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水平轴上及垂直轴上加以考察。在水平轴上,克里斯蒂娃强调文本同时属于写作主体与接受者双方。在垂直轴上,她则认为任何文本都受到所有前时代以及同时代文学资料的影响。水平轴与垂直轴、对话与对立物的并存以及由这种并存带来的历史、社会与文本的相互嵌入,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文本间性。按照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独白只是一种假设,对话才是存在的真谛,纯粹的单一逻辑的独白仅仅是理论上的虚构,任何言述都是对话。这与巴赫金所说的语言之真正现实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巴赫金 1998a: 447)以及对话的泛音存在于所有表述之中(巴赫金 1998b: 224)等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 3 语言学思想源泉

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阐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批判结构主义符号学局限性的同时,受到其创始人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虽然她反对索绪尔的静态语言观,更强调语言符号意义的动态性和形成过程性,但不可否认,索绪尔思想是她的符号学思想的基础。

索绪尔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语言行为总体中的抽象意义上的规则体系(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同时,索绪尔认为,言语作为语言行为总体的另一组成部分不可能成为语言学的科学研究对象。言语只是语言体系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运用。因其存在的干扰因素太多,无法实施真正客观和科学意义上的研究。(索绪尔 1985: 28 - 32)另一方面,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两部分。能指“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索绪尔 1985: 101),即概念的音响形象。所指是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抽象概念。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也就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特点。

克里斯蒂娃接受索绪尔的语言系统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扩展。她从文化符号学观点出发,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一个整体(Kristeva 1980: 167 - 169)。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关照。例如,在文学作品这个整体中,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受到系统中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对其他文学作品的折射。克里斯蒂娃在社会与历史大

文本中思考问题,并把社会与历史当作文本本身,这与索绪尔在语言这一大系统中思考言语问题,探索语言的本质具有相似性。同时,虽然克里斯蒂娃反对能指与所指的简单对应关系,但她还是接受索绪尔对符号的这种二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独特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没有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关系问题,没有他所提出的意义研究问题,就没有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意义生成性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既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批判对象,也是其诞生的摇篮,对其形成、发展甚至成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理论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对克里斯蒂娃影响最大的是他晚年对易位构词(anagram)进行的研究。克里斯蒂娃借鉴索绪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阐述自己的“扩词”(paragramme)理论,并将它解释为文本间性的一种表现形式(Kristeva 1980: 69)。易位构词指通过调整一串具有固定意义的文字中字母的顺序而组合出新词的现象。索绪尔从1906年到1909年初致力于这种研究,他在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诗中发现了与诗歌内容不同的文字群(西川直子 2002: 68-78)。它们通常情况下是一些固有名词甚至神的名字。索绪尔将这些文字称为可易位词或可扩词。他甚至认为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一种特有的逻辑,即易位构词(anagram)作诗法。也就是说,索绪尔在其后期的研究中开始放弃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因为他发现了用他自己先前的理论所无法说明的东西,即在线性符号上存在着具有其他意义的东西。索绪尔的研究在给人们带来惊奇的同时,也给文学的语言研究带来深刻影响。克里斯蒂娃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进行文本理论研究的人之一。她把索绪尔对字谜的研究当成丰富的源泉,从中汲取很多内容,认为在研究文本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扩词”理论对所研究文本进行变形,以便看到隐藏在结构下面的另一种意义(Oliver 1997: 9)。对此,罗婷(2004: 58-60)认为,克里斯蒂娃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研究比索绪尔更加深入,因为克里斯蒂娃在强调文本内各成分之间相互联系的同时,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以及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文本间性关系,从而“彻底打破语言物质的封闭性,展示其流动性、双重性和对话性。于是,文本成为各种可能存在的意义之交汇的空间”(罗婷 2004: 59)。

#### 4 结论

在构筑自己的符号学理论时,克里斯蒂娃没有局限于传统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围,而是从各种学科的方法中得到启示,并试着将它们转换成她的解析符号学研究方法,力图将符号学从语言学意义传达图式扩展为另一种具有独立特征的学科。(西川直子 2002: 27)她受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影响,探讨作为生产物的文本在形成以前的意义形成问题。她接受黑格尔的否定观,运用这种方法探讨文本间性的形成方式。通过接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蒂娃向我们阐述了文本的多重关系。她在索绪尔语言学研究贡献的基础之上,将文本或符号作为系统研究,将文本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历史本身并不是文本研究的背景,而是构成文本的一个特有元素,从而超越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

#### 参考文献

- 巴赫金. 周边集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a  
 巴赫金. 文本、对话与人文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b  
 李 增. 从《小世界》看巴赫金狂欢化的反讽 [J]. 外国文学, 2005 (5).  
 罗 婷. 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 [J]. 当代外国文学, 2002 (2).  
 罗 婷. 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西川直子. 克里斯蒂娃多元逻辑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Kristeva, Juli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M].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Kristeva, Juli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Oliver, Kelly (ed). *The Portable Kristev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Smith, Anne-Marie *Julia Kristeva: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M]. Pluto Press, 1998